

【论 文】

“民族”与“宗族”的艰难调适¹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宗族论”的命运简析

杨思机

“民族”一词自清末从国外传入中国后，如何用来指称中国版图内的不同人群，历来充满争议。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之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应改称“宗族”的观点（简称“宗族论”），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人斥为否认民族客观差别、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实则指称民族只是界定人群异同的方式之一，蒋有针对性地对日本侵略的分化手段，拒斥苏联、欧洲国际少数民族理论的特殊背景。有学者论述了“宗族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由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独特地位，“宗族论”得到广泛播扬，一度成为“正统”，为更加细致考察具体动机、社会反响和失败原因，进一步揭示解决民族问题不同主张的相互关系及深远影响留有空间。² 本文努力客观分析“宗族论”从提出到失败的过程，以期加深理解民族问题的长期复杂性。

一、蒋介石“宗族论”的提出

《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通过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民国都是中华民族生存疆域，阐明国民党领导实现复兴的希望。

蒋介石说：“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继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秦汉时代在北方主要为求民族生存，游牧宗族来犯则“制以武力”，归顺则“施以文治”，在南方主要为求民族生活开发。“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五胡乱华后皆渐趋汉化，袭取中国衣冠政教，隋唐大一统使众多宗支的文化，包括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俗等融洽于一炉。契丹（辽）、女真（金）、蒙古是中国北部与东北部“未完全同化的宗族”，先后入主中原，最终浸润于中原文化，辛亥革命后都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蒋介石强调，中华民国的领土都是中华民族固有生存领域，只有成吉思汗的西征超越了这个范围³。蒋介石着重阐明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动力和同化方法，强调血统、婚姻、经济、文化因素的历史性作用，以及中国民国的领土、人民同属中华民族的不可分离性。

就蒋介石的民族思想而言，“宗族论”至少可追溯至1941年。当年2月2日，蒙、回、藏三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向蒋介石献旗，蒋致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蒙、回、藏和汉、满五族合一的民族，我们常常说蒙、回、藏，是就我国的土地而言的名词，并不是讲我们人种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说自汉代以来，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血统和我们全部文化，早就没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年中卷（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

² 详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³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增订本），正中书局1943年3月10日初版，1946年沪15版，第1-7页。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¹ 蒋的训词发表在《中央训练团团刊》，“为外间所不经见”。² 2月3日中午，蒋设宴招待蒙、藏、回、满各族代表，翁文灏说蒋“讲汉、满、蒙、回、藏皆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国民，共同一致”。³ 1942年8月27日，蒋巡视西北期间在西安对青海活佛、王公演讲《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首次正式阐述“宗族论”。他说：“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诗经上说‘本支百世’，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各单位融合一体的性质和关系。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⁴ 蒋这次训词，当时“详细内容未便发表”。⁵可见，蒋态度谨慎。

综上所述，“宗族论”脱胎于同属黄帝子孙的中华民族一元论，同时试图包容中华民族融合论。蒋介石吸收了一些学者的观点，也有意针对学界的民族概念论争。据黎东方说，1938年夏，黎在汉口曾向教育部长陈立夫建议：“中国是很多民族的大结合，讲历史的人该强调如何团结，如何合作。过去汉族与匈奴的斗争，蒙古与满族如何灭了宋朝、明朝，已成过去，应该说汉蒙与汉满原本有血统上与语言上的关系，今日面临日本的侵略，更是存则共存，亡则共亡。”在场的吴俊升建议黎多加发挥，黎写了一篇文章给陈立夫，陈似又转交给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宗族”概念采用了熊十力、胡石青和他的观点却未明言，导致参与该书写作的陶希圣被异议人士大张挞伐。⁶

黎东方所言不无根据。1938年夏，熊十力给弟子讲授中国历史，利用考古学上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发现，认为中国五族同出一源，都是“北京人”后裔，只是后来繁衍地点不同而形成差异，建议“今不当复分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名，只统称华族可也。”⁷胡石青1935年起着手编纂中华民族史，“考证中华民族为多数部族混合而成，炎黄蚩尤皆我宗祖，未可持偏隅之见”。1939年胡石青又在重庆讲演“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抗战”、“中华民族之特质”、“中华民族发展的略史”⁸。其中西南民族史部分，“纲领已定，草创甫半，其主旨为炎黄一系，而力辟倭人泰民族为汉民族所驱逐之荒谬”。⁹ 蒋介石曾请胡石青讲述财政问题并有意延揽入幕，胡允任国防设计委员。抗战爆发后，胡石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又上书蒋介石论政治结构和组织问题，胡的观点可能为蒋介石采纳。

“宗族论”根本目的是统一国民的中华民族观念，最大依据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1919年，孙中山重新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以汉人文明为基础，汉族废除自尊自大的名称、血统与文化，与满、蒙、回、藏人民共同熔铸成为一个大中华民族，最终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蒙古“独立”，内蒙古“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共产党领导苏维埃革命均主张民族自决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倡导中华民族同源论，极少使用含有清末排满革命思潮、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和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理论思想渊源的“少数民族”概念，在制度上以行政区域进行统驭，自治、参政、管理等皆以行政区域为范围，不以民族

¹ 《中央训练团团刊》第61期，1941年2月10日，第482页。

² 《委座对蒙藏回训词五族原是一家》，《边疆通信报》第3年第74号，1941年5月10日，第2版。

³ 翁文灏：《翁文灏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5页。

⁴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的责任》，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二册，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1年版，第1422页。

⁵ 伊人：《总裁论宗族与民族》，《中央周刊》第5卷第42期，1943年6月3日，第12页。

⁶ 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03、237-238页。

⁷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熊十力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4页。

⁸ 郭豫才：《胡石青先生年谱》，《再生》第87期，1943年2月15日，第10-11页。

⁹ 王幼侨：《胡石青先生之遗著及晚年》，《再生》第87期，页码不详。



为形式，试图遏制国内民族划分。¹“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政治重心西移，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骤然增加，学术界爆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支持者大致分为融合论，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²和同源论，以国民党为代表，也得到一些学者支持。为了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民政府下令禁止滥用番、蛮、獠等含有侮辱歧视意义的固有族类称谓和“少数民族”名称，废除“汉族”称谓，非汉人一般改为生长所在地人，后统称“边疆民族”，简称“边民”。³这些努力均未能遏止“民族”概念使用的“泛化”，蒋介石以抗战领袖阐明中华民族的整个性，有其特殊背景、现实需要和通盘考虑。

1941年新疆盛世才投诚，盛世才依据苏联民族理论划分新疆境内人群为十四个民族，标榜为六大政策之“民平”的做法，对国民党的“中华民族”整个性观念造成巨大挑战，蒋介石更加迫切需要统一民族观念。1942年5月，日军完全切断滇缅公路，西南陆路国际运输线中断，西北交通更形重要，必须解决民族问题。1942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日记写道：“蒋先生自兰州来电，嘱中宣部派员赴新疆接办《新疆日报》，并发动宣传工作。盛世才因苏联之压迫，于无力相抗，乃转而倾向中央。新疆前途究竟如何发展，令人忧虑。”⁴10月29日，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组部招待赴新疆工作同志茶会席上发表讲话，指出所谓新疆民族，“亦即宗族”⁵，此“宗族”概念当援自蒋介石。

国民政府下令禁止滥用虫兽偏旁等具有侮辱歧视意义的族类称谓后，许多国民党人没有认真执行，蒋介石也不例外。《中国之命运》书中提及辛亥革命时，袭用了排满革命鼓吹的驱除鞑虏一类语汇。徐永昌说：“余对于第一章以为对中国历史尚有未尽了然，而忽略汉、满、蒙、回、藏大皆炎黄子孙。”“蒋先生忽略了汉以前无所谓汉族，亦忽略了华夷本属一家的事实，及华夷所以分的原委。”“对第二章以为总理恶清廷政治，欲颠覆之，所云驱除鞑虏、满族等等，不过是一种临时适用的方法，在今日谋建国对外之时，而仍据对内革命用语，则不免大误。”⁶徐倾向于确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的历史观。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国人的民族观念，蒋介石接受徐的建议，提出注意民族及边疆问题的四项指示，下令全国遵守。第一为：“我国人民有宗族之分支与种族之区别，闭关时代，所见者小，以五胡为外族，目元清为夷狄。今日视之直与周代以荆楚为南蛮同一情形，古之所谓四夷四裔，固无一而非炎黄子孙，近之所谓满、蒙、回、藏，亦复如此，要皆中华民族也。……国父讲某民族主义，首口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指示最显明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一书称为‘宗族’，不曰各民族或各种族，亦即此意。”第二、以往各宗族间之战争，皆在中华民国版图以内，除唐代征战波斯，元代经略东欧，明代对倭作战外，全民族对外战争自此次抗战开始。第三、禁用苗、夷、蛮、獠、胡虏、满奴、华北、华南等名词，以免为人离间分化。第四、研究古史应寻绎、阐扬民族融和与国家统一的渊源，各有关机关应多研究，日常施政行令和宣传刊物均须注意，历史、地理、公民教科书应以此为原则编辑、修改。并说，研究历史上的各宗族关系要讲事实，更要有“彼一时此一时”的历史眼光。⁷蒋介石在西宁的《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致词，也由国民党中宣部出版单行本，流传甚广。⁸

¹ 详见杨思机：《20世纪30年代内蒙自治声中蒙藏委员会改组刍议》，《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民族——抗战前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策略》，《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² 顾颉刚、傅斯年的观点另文详述。

³ 详见杨思机：《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⁴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第2册，1990年，第350页。

⁵ 《新疆壮行词》，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616页。

⁶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徐永昌日记》1943年4月8日，1991年。

⁷ 《广西省政府公报》1943年第1840期，第5-6页。

⁸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3年。



国民党人公开普遍赞许“宗族论”。有人认为，日本怂恿暹罗改称泰国，倡导“大泰族主义”，妄想囊括中国西南部分边胞，“宗族论”是最好回应。¹有人盛赞“宗族论”，认为日本称东四省为满洲、满洲人的满洲，这不符合中华民族自然发展历史，危害中华民族生存，应拼死斗争。²有人认为，“宗族论”是三民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发展，各族国民既已打成一片，就不必拘泥若干形式不同而保持民族畛域，授人“分化与离间的机会”。³有人认为，“宗族论”阐述了中华民族调和冲突的三个时期，即秦以前造成汉宗族基础，汉至唐五胡宗族和汉宗族竞争并完全同化于后者，宋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经过四代的冲突、调和、分治、互治、共治，形成今日的世界最大民族的中华民族”。⁴黄奋生认为，“宗族”名称有助于明了同属中华民族一个血统，具有共同命运，致力民族团结，避免“民族”二字为人误用，免去帝国主义挑拨分化的口实。⁵总之，“揭出了新民族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奠定了新民族政策的坚实基础。”⁶

二、国民党外对“宗族论”的迎拒

国民党外对“宗族论”褒贬不一，中共和一些人类学者批评蒋介石是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不少学者倾向于接受，但立论根据和指向并不一致。

中共将批判《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手段。1943年7月21日，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著成《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修改定稿。⁷该文主要观点有：第一、民族血统论是法西斯主义侵略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历史。“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第二、“宗族论”违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第三、按照“宗族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将成为糊涂账。历代民族斗争如汉代与匈奴等等，如果只是民族内战或大小姓冲突，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等可歌可泣的汉民族英雄，都成了“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等“汉奸”，反而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全部中国历史都要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⁸即“汉族”不存在，各民族斗争理解为内战，就无民族英雄和汉奸分别。从国民党多以同源论阐明中华民族整个性的角度看，陈伯达的批评无不道理。陈伯达把“中华民族”仅仅理解为“中华诸民族”，也忽略了各民族祖先历经长期密切交往，逐渐趋于融和的一体性，“汉族”意识更加根深蒂固。

投身汪伪的胡兰成批评蒋介石说，民族不是自然成长，而是经过征服同化形成。“淮夷现在是没有了，就因为我们的汉族祖先把它征服了。即如所说五族共和构成一个中华民族，依蒋的‘自然成长’的说法，则已往几千年的历史，如五胡乱华之类，简直等于不曾发生过，而辛亥革命的意义也无从了解了。”⁹突出各族对抗和斗争，避开了“彼一时此一时”的含义和针对日本侵略的因素。

¹ 钱梦超：《西康夷族与夷务问题》，《川康建设》第1卷第2-3期合刊，1943年，第61-62页。

² 高叔康：《读〈中国之命运〉》，《华侨先锋》第5卷第4期，1943年4月，第6页。

³ 罗刚：《读〈中国之命运〉》，《中央日报》1943年4月27日，第3版。

⁴ 宗明：《恭读总裁〈中国之命运〉》，《文化导报》第3卷第5期，1943年5月31日，第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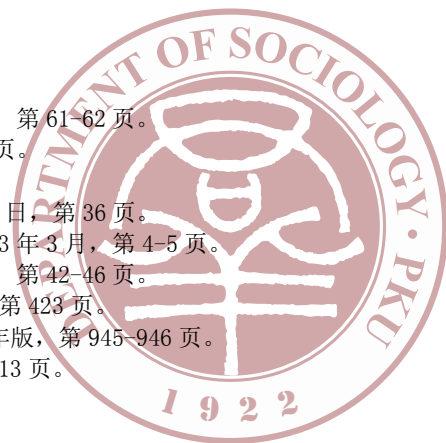
⁵ 黄奋生：《〈中国之命运〉与民族政策》，《中国边疆》第2卷第1-3期合刊，1943年3月，第4-5页。

⁶ 黄奋生：《中国之命运与新民族政策》，《新中华》第2卷第2期，1944年2月，第42-46页。

⁷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⁸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946页。

⁹ 胡兰成：《〈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新东方》第9卷第2期，1944年2月，第13页。



国民党严厉查禁陈伯达的文章，¹并组织反驳。周梅寒认为，尽管中华民族各宗族不可分离，但国民党绝对尊重其历史和地位，例如政治权利力求各宗族领袖共同参与和领导，只有允许汉族独揽治权，其他各族变成奴隶，才是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等民族英雄，当然值得讴歌崇拜，而石敬瑭、张邦昌、董卓、秦桧、洪承畴、汪精卫等大小汉奸，当然在口诛笔伐之列。作者反诘称，只有“汉奸”才会提倡民族自决，分化中华民族。“因为这么一来，外蒙古当然可以成立所谓‘共和国’，西藏、新疆、东北等当然也可以自成一国，驯至华北、华中、华东等沦陷区，自然也可以合乎所谓‘民主根据地’之名，来封建割据一番。”² 国民党一大宣言被中共认作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阐释”，但恰不代表孙的观点。³

中共党内真正能批倒蒋介石的是周恩来。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秉持的是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⁴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回应国民党的宪政运动时提到，宪法必须承认“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⁵。换句话说，民族名义如果不存在，各种民族形式的特殊待遇即化为乌有，非汉民族就不会认可“宗族论”。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延续这一思路，号召将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的民族政策作为处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准则，“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⁶以孙中山继承者的口号提出动员和争夺少数民族的任务。

后来中共又把蒋介石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宗族论”自然被斥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中共对“宗族论”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否认少数民族存在，称他们为“边民”，或中华民族甚至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个别人类学者也不认同“宗族论”。如卫惠林说，“民族一元论与边族否定论”都是似是而非的理论，“由若干浅薄的历史考证来说明边疆民族之与汉族同源，以证明边族否定的统一同化政策之合理性，认为由此种种理论之提倡可以消除边族分化之危险，造成民族统一的心理基础而省略许多边疆建设的实际步骤。”国内民族问题存在是“客观事实”，“谁也知道蒙古、新疆、西藏与西南诸省的少数民族，大部有其独自的语言、文化与特殊政教制度，单此等事实即已构成了中国边疆问题之真实性，无论国内民族是否改称宗族，或从历史考证上是否可以证明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皆不足以变动问题之真实性”。⁷ 认定国内语言、文化、政教不同的人群就是不同“民族”。

“宗族论”却也得到许多学者赞同。金毓黻由受民族分别思想影响，转而盛赞“宗族”名词十二分妥当。“我论中华民族的来源，向主张一元论的，不但满、蒙二族与汉族为同出一源，就是回、藏、苗各族，也与汉族有血缘的关系，不必自生分别，反主为客。”⁸一元论是指最初一元。“然至周秦、两汉之际，吾国民族已大有演变而分为多支，即为后来各族之来源，于是由一元而分为多元焉。”⁹研究东北史要注意内族外徙、外族内侵、内族御外、外族内向四个方面。“内族

¹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23页。

² 周梅寒：《关于〈中国之命运〉》，《华侨先锋》第6卷第5期，1944年5月15日，第16页。

³ 参见杨思机：《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⁴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26页。

⁵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29-730页。

⁶ 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⁷ 卫惠林：《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公论》第4卷第1期，1945年1月，第2-3页。

⁸ 金毓黻：《中华民族与东北》，《东北集刊》第6期，1944年1月，第1、7页。

⁹ 《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金毓黻日记》第七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491页。



外族之称本非甚当，内族即汉族，可称中原本族，亦犹宗法之有大宗也。外族即其他诸小宗族，可称四裔分族，亦犹宗法之有小宗也。今日吾国之诸小宗族，往往自外于汉族，其情正复类此。如其出于一本，应归还于本宗，则自相歧视、自相残杀之事，可以永绝根株矣。”¹

1939年3月，刘节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资助，专门研究上古氏族与民族关系及迁徙情况。他认为，上古中国民族已经三度同化，由夏民族、周人远祖的鬼方、猃狁，殷民族的东夷，东西周和春秋战国的西戎，形成“汉人”这一大族。“匈奴以夏为始祖，而中国亦诸夏之苗裔，其血统上实有直接关系也。……秦汉之际中国人入匈奴者不知凡几，其同化力量较和亲尤过之。”²1939年下半年开始，刘节在中央大学任中国文化史课程，认为中国人自黄河流域向外逐渐推广，“皆以文化为中心，至于民族则自四裔向中部集中，逐渐同化于一炉矣。”³所谓“汉族”，“乃是从文化的观点上所立人种学上的名词。”原因：第一、人类起源和汉族来源多元；第二，种族形成都经过长期蜕变，历程复杂而且长远；第三，民族有“土著”和“行国”之分，但迁徙是必然现象。“汉族的意义，是以文化为标准的。不论蛮、夷、戎、狄，经过这种文化的陶养之后，都可以称为汉族。”汉族不是一成不变，应按照时地顺序梳理，“地域的转移，可以看出汉化的流动与传播；时代的参差，可以看出民族蜕变的层创关系”。⁴刘节反对将人类学的“种族”、“民族”、“宗族”、“氏族”、“部族”等意义不同的概念套上中国史料，主张“站在民族文化的观点”研究各族关系。其研究报告后由正中书局出版，名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论》。⁵

姚薇元认为，汉、满、蒙、回、藏、苗、僮诸宗族，经五千年共同历史，生活在同一政治教化之下，虽间有政权变迁，势力消长，民族愈接触而愈融和，愈交织而愈密緻。“就现状言：满族已完全混化。蒙、藏二族因限于地理环境，仍有一小部分习游牧生活。回族则因宗教之隔阂，习俗稍异。至苗僮族与汉族渊源极古，其生活风俗，实即吾先民之生活风俗，特以居地贫瘠，经济困难而文化落后耳。”⁶与刘节同样倾向于融合论。

人类学家吴定良在《中央日报》撰文说：“少数外籍学者，根据其不正确之观察，或存政治作用，谓边民血统源自西方，或谓与犹太及亚利安阿尔宾等族有关，甚至谓广东人为泰族后裔。……国际间剧烈之战争，往往肇自少数民族血统来源之纠纷，吾人此时急宜根据正确事实，采用科学方法，加以矫正。”国内各宗族名称虽多，但历经数千年政治经济及文化之交流，血统早已混合，各族相依生存，中华民族由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说法符合“科学事实”。⁷俞剑华根据“宗族论”的宗旨撰成《中华民族史》一书。⁸曹树勋批评边疆民族问题变得复杂，原因是民族名词运用失于审慎，涵义没有确定，加上狭隘历史观念影响，而外国学者不怀好心地故意对中国人进行分支别类，挑拨离间，国内学人引为护符，标新立异。认为解决问题首先在于“正名定义，辟历史之讹传，正国人治学之态度”，以“彼一时此一时”的眼光解释历史。“曾记西藏学者喜饶嘉错大师在中央政校演讲，大意以‘手’比喻‘中华民族’，各族同出一本，犹五指之同出一掌，谓其粗细、长短、名称，虽有差别，而其同称为指，同为手指一分子，则彼此相同。此说不但足为‘宗族’之注脚，揆诸史实，并亦信而有征。”⁹

岑家梧原本用“西南民族”统称中国西南地区非汉人群，他的老师胡体乾主张改称“西南种

¹ 《金毓黻日记》第七册，第5449页。

² 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42、62页。

³ 《刘节日记》上册，第163-166页。

⁴ 刘节：《汉族流源初探》，《图书月刊》第1卷第3期，1941年3月31日，第1-6页。

⁵ 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

⁶ 姚薇元：《中华民族之整个性》，《边疆通讯》第3卷第1期，1945年1月。

⁷ 吴定良：《国族融和性在人类学上之证明》，《中央日报》1943年6月20日，第3版。

⁸ 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南平：国民出版社，1944年3月初版。《中国之命运》研究丛书之一。

⁹ 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1月初版，同年11月沪1版，第76-80页。



族”。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发生后，形形色色的民族概念令他茫然。杨成志建议改称“西南民族”、“西南土著”或“土族”、“西南苗夷”等，岑家梧坚持使用“西南种族”名称。当他投稿《文史杂志》时，主编顾颉刚建议改为“西南部族”。当时边疆与民族研究方兴未艾，“自此而‘边族’、‘边胞’、‘边民’、‘土人’，而至‘苗胞’、‘摆胞’、‘藏胞’等名词百出，无所适从。”岑家梧认为，“宗族”一词“比较上述的任何一种名词都要适当”，因为中华民族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情形，“宗”与“族”的结合表示彼此的宗本关系，对于不同始而同终的各族有警醒不忘本之意，“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最能道出中华民族演进的史实”。国内各宗族本身还有差别，正需要兼容并包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到时“宗族不过成为历史的名词罢了”。²岑家梧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说：“此刻检讨我全部的作品，这应该是错误最严重的一篇，也就是我有生以来思想上最大的污点。”³反面说明支持“宗族论”的程度。

三、“宗族论”在内外交迫中失败

蒋介石的“宗族论”并未取得成功，原因相当复杂，可从法理依据、新疆问题、美苏施压以及非汉族的实际态度等四大方面分析。

第一，法理依据。

孙中山晚年主张各民族团结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是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中共妥协的结果，但国共两党可以各取所需，证明自己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正继承者。1944年4月28日，朱家骅在国民党第二次边疆会报上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建国大纲》是国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明白主张。⁴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难免不被攻击违背总理遗教。

国民党也有人响应“宗族论”。1940年3月12日，孙科在重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演讲“国父与苏联”，认为苏联建设成功代表国父三民主义的实现，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即国父的民族主义。⁵1943年11月15日，孙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演讲“宪法要义”，明确说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⁶前者或许有中苏外交的考虑，后者是身为立法院长解释宪法，显然不买“宗族论”的帐。

“宗族论”既未上升为国民党全党意志，亦未转化为国民政府决策，只是在国破山河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团结抗战，蒋介石成为领袖的背景下，才形成广泛影响。

第二，新疆问题。

盛世才投诚后曾说：“实际说起来，三民主义就是六大政策的原理原则，六大政策也就是本省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方案。……而六大政策中的反帝、亲苏、民平、和平四个政策，正是在新疆实行了民族主义的必要的特殊任务。”国民党欢迎盛世才投诚，梁寒操、朱家骅等都高度评价“民平”政策，⁷用意主要在于盛世才保住了新疆，没有倒向苏联。在未充分掌握新疆局势前，国民党只有继续不断的阐述三民主义和六大政策的紧密关系，试图将后者逐渐改造到三民主义中来。新疆教育厅长程东白说，十年来新省教育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水平提高不少，国民党应将其改为以民族为形式，以三民主义为内容。⁸也就是说，在新疆主义内容可以

¹ 胡体乾：《关于种族名词及民族政策》，《今日评论》第3卷第17期，1940年4月28日，第204-205页。

² 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第3卷第4期，1944年4月，第9页。

³ 岑家梧：《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光明日报增刊》1951年1月27日，第5版。

⁴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627-629页。

⁵ 孙科：《中苏关系》，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1月初版，第4页。

⁶ 孙科：《宪政要义》，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2月初版，第16页。

⁷ 汪洛生：《新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央周刊》第5卷第29期，1943年3月4日，第12、14页；《新疆的希望》，《中央日报》1943年9月29日，第2版；《去新疆后》，《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624-626页。

⁸ 《新疆教育现况》，《边疆通讯》第1卷第9期，1943年7月。



改变，但以民族为形式短期难以改变。投入国民党怀抱的新疆尚且如此，遑论国民党不能实际统治的西藏、蒙古。

第三、美苏施压。

1944年6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团访华，先考察新疆，后赴重庆。6月21日晚，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官邸设宴欢迎。华莱士发表演讲，申述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指示，渲染美国对待菲律宾的成绩，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境内，诸君亦有若干少数宗族问题。贵国昔年之五色国旗，乃构成中华民国五大宗族之象征。国民政府现虽改用‘青天白日’旗，然孙中山先生对于弱小宗族所抱之同情，及其竭毕生之力谆谆以教其国人者，当可为诸君将来对中国境内少数宗族问题觅求合理解决之保证，一如诸君与吾人将在国际方面共同努力以谋殖民地问题之解决也。”与“少数宗族”对应的英文词汇，正是国民党人极力反对用来指称国内人群的 minority。¹ 王世杰将华氏此意概括为：“远东未获得自治之民族，须定期予以自治，中国之内之少数民族（按此系暗指新疆及蒙古诸族）亦然。”² 6月28日，黄炎培访翁文灏谈华氏访华目的，谓“华莱士在西伯利亚三周，命驻苏大使持此谒史太林，史答语中含三要点，嘱华莱士告中国当局”，其中希望“中政府对国内各民族，各党派调洽合作，尤希望注意共产党”。蒋的答话提到：“对各民族愿在国体所容许下，就其能力所及，给予于高级自治亦可。类如内蒙、新疆、西藏，余绝对接受罗劝告。”³ “罗”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将中国与少数民族定位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蒋初步被迫接受各“民族”的提法。

以菲律宾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黄奋生撰文回应华莱士说，扶植少数宗族自治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但“中华民族的构成，与世界各大国家民族的构成有所不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若非同源共祖，即累世婚姻相结，只能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不同宗族分支。《中国之命运》称之为“宗族”，就在于指出这一“本质”。“中国境内的少数宗族，不是中国的藩属人民，而是同源于一个始祖的兄弟、亲戚”。美国对菲律宾的“贤明措施及其成绩”，菲律宾人应当感谢，可以为独立国家对于藩属关系的“最好榜样”，但不能作为中国参考，盖“我们与少数宗族之关系，本质上与美国与菲律宾之关系不同也”。“少数宗族”长期受地理环境影响，与中原宗族远隔，形成语言习俗不同的另一文化形态，自治方式将与内地各省不尽相同，拥有更广泛的自治权力，但是必须在民族统一、领土统一的大原则下施行，不能将其他国家的联邦方式，套用在我们各宗族的政治关系上面。⁴ 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楚明善说，中国处理边疆问题有误解和模仿之虞：“一、认为边疆为征服地，宜模仿英国之殖民政策，一、认为边疆为向化地，可模仿苏联之加盟政策，然均非对症下药之举措。”主张设法纠正这两种思想倾向。⁵

国民党可以拒绝美国的建议，却不能回避苏联的影响。1945年7月1日，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请示蒋介石，谓有关方面密告：“史向人表示，新疆汉人究系少数，中国政府对其他民族应较前开放，始能相安无事。”⁶ 对外蒙问题，国民党最后以其投票公决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在共产党和东北问题等方面的妥协。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署后发表演讲，承认外蒙独立以投票方式解决，承诺给予蒙、藏民族高度自治。蒋介石在日记中，

¹ 《华莱士副总统答谢蒋主席演词》，旅端施主编：《当代文献》第二合订本（第76-100号）下卷，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第479-480页。

² 《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1944年6月21日。

³ 朱宗震整理：《黄炎培日记》第8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82-283页。

⁴ 黄奋生：《读华莱士关于我国西北及边疆宗族讲演之后》，《中国边疆》第3卷第5、6期合刊，1944年6月，第3-4页。

⁵ 楚明善：《边政回忆与展望》，《边政公论》第4卷第1期，1945年1月，第1-2页。

⁶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第575页。



思考新疆问题虽仍用“宗族”概念，¹但“宗族论”实难坚持。

第四，非汉族的反对。

国民党广泛向“边民”宣传“宗族论”。1943年10月，新疆省教育厅聘请黎东方讲“宗族之渊源与中华民族之形成”，主要内容在黎给陈立夫的文章中已经提到。²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将“民族”列为12个考察部门之一，初由民族学家吴文藻负责，后改成“宗族篇”，由团长罗家伦亲自执笔，详述与各宗族接触情形。³该团成员戈定邦在兰州省党部演说新疆各宗族生活，“并由人类学原理说明人类种族区划之由来，证明总裁所创‘宗族’名词之正确。”⁴1944年10月出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认为，施政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增进宗族互信”。⁵《中央日报》在欢迎拉甘肅拉卜楞寺代表团的社论中指出：“乌斯藏族与中国各宗族同出一源。”⁶该报还就达赖祝贺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事评论说：“日寇及其奸徒最嫉忌我蒋主席的中华民族一元论。中华民族之内各宗族同源，在历史记载上是斑斑可考的。”⁷

非汉族普遍认为，民族形式有助于实现事实平等。1941年2月3日，蒋介石设宴招待蒙、藏、回、满四族代表时，各族均批评以往五族共和是空言。西康藏人格桑泽仁希望抗战结束后，“委员长对我们蒙、藏、回族人民政治上予以一种确实比例的平等。这就是说，政治除依照区域为标准，及人口数目为标准之外，同时请注意我们民族的地位。”⁸即按民族人口比例参政。1944年10月13日，默罕默德·伊敏等以新疆同乡会名义要求国民政府：第一、确定新疆民族为突厥族；第二、宪法规定突厥族民族自治之条款；第三、修正《宪草》中的“新疆”二字为“突厥斯坦”⁹。此事引起国民党高度关注，黎东方更与伊敏爆发了关于“新疆同胞是否突厥族”的论战。黎东方极力否认新疆同胞是“突厥族”，伊敏反驳时称：“突厥族是民族，而非‘宗族’或‘家族’。”¹⁰“宗族论”否定了非汉族以民族为形式的利益诉求，难获认同。

中共在旧政协会议提出少数民族的参政问题后，“少数民族”日益成为国内各政治势力共同使用的概念，一般国民党人也不再避忌。非汉族对于各种指称起初没有明显偏好，“少数民族”能为争取以民族形式参政和获得民族自治方式提供理论基础，逐渐受到被指称的认同和发挥。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蒋介石解释宪法不必罗列各民族名称等问题，依然主张不宜使用“少数民族”、“土著民族”称谓，但也不得不放弃了“宗族”名词。¹¹

黄兴涛敏锐指出，蒋介石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不顾早已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的既成说法，忽略各小民族大众自身原有的民族身份认同实际，这无异于简单粗暴地否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原有“民族”资格，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¹²从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看，蒋的“宗族论”不能说出于心血来潮，更多体现为外来民族理论本土化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其失败命运也提示民族问题的长期复杂性，决定了民族政策应不断改革创新，兴利除弊。

¹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第764页。

² 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第237页。

³ 罗家伦：《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经过报告》，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史馆党史委员会，1976年12月21日初版。

⁴ 《戈定邦在兰作学术演讲新疆各宗族生活》，《中央日报》1943年12月2日，第3版。

⁵ 《吴忠信宣誓就职》，《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1日，第3版。

⁶ 《欢迎拉卜楞寺代表团》，《中央日报》1944年1月5日，第2版。

⁷ 《民族团结的象征》，《中央日报》1944年3月7日，第2版。

⁸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南京：新大陆印刷厂，1946年11月，第21-22页。

⁹ 《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大公报》1944年10月13日，第1张第3版。

¹⁰ 默罕默德·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中央日报》1944年11月24日，第3版。

¹¹ 详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论文）第五章“‘少数民族’从他指到自称”。

¹² 前引黄兴涛论文。

